

数字媒介的技术演进与生存论考察

An Existentialist Inquiry into the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of Digital Media

于秋颖 / YU Qiuying

(浙江树人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 浙江杭州, 310015)
(Research Center for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nsultative Democracy i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Zhejiang Shuren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5)

摘要: 数字媒介技术已从工具进化为“第二自然”, 其演变本质上是人类感知外延与认知内化的双重进程, 这种技术演变将重塑人类的沟通方式、文化形态和社会结构, 需要多维度平衡和多角度审视。对数字媒介的技术史梳理与主体生存的哲学考察将在三个维度展开, 并试图提供一种结构化经验范式: 一是在技术史视域下厘清数字媒介的演进历程, 明晰媒介演进中何种技术发挥着主导效用; 二是通过审视智能媒介导致的生存论问题, 揭示其具有推动主体自我解放与产生反身控制的两面性; 三是阐明数字化生存的意义危机——技术增强的终极目标仍是服务于“人”的生存体验。

关键词: 数字媒介 技术元叙事 经验范式 效能 生存危机

Abstract: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has evolved from being a tool to being our second nature. This evolution is essentially a double process of the extension of human perception and internalization of cognition, and it will reshape human communication methods, cultural forms, and social structures. Therefore, it needs to be balanced and examined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technological history of digital media and engages i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of subjective existence in it. The inquiry will be conduct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and a structured empirical paradigm will be provided: First, the evolution of digital media will be clarifi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ical history, elucidating which technology has played a primary role in the evolution of digital media; Second, the dual aspects of smart media—simultaneously promoting the self-emancipation of subjects and creating reflexive control—is revealed by examining the existential problems caused by them; Third, the crisis of meaning in digital survival is clarified, namely, the question of how technological enhancement can still serve its ultimate purpose of serving the life experience of “human beings”.

Key Words: Digital media; Technological metanarrative; Empirical paradigm; Effectiveness; Existential crisis

中图分类号: H085.4; N031 DOI: 10.15994/j.1000-0763.2026.08.006 CSTR: 32281.14.jdn.2026.08.006

数字媒介时代的技术研究聚焦具体的技术与技术物, 探绎“技术黑箱”被开启后不断出新的技术图景。但此种进路亦导致技术研究缺乏整体性的理论视野, 容易走向旨在突出技术独特性的语言游戏, 难以为人们贡献从技术出

发审视其生活世界, 并对其在世生存有所启发的方案。有鉴于此, 本文提出建构数字媒介时代的技术元叙事。有别于推崇本质抑或真理的现代性元叙事, 此种技术元叙事为“后退一个层面的叙事”, ^[1] 突出相对性建构特质, 主要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与实践过程研究”(项目编号: 24&ZD116)。

收稿日期: 2025年8月3日

作者简介: 于秋颖(1984-)女, 辽宁丹东人, 浙江树人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数字技术、社区治理。Email: yuqiuying1017@163.com

从三个维度递进展开:1. 在技术史视域下厘清数字媒介的演进历程,以此明晰数字媒介的技术特征及其技术物谱系。2. 考察数字媒介时代人的生存论内涵,揭示数字媒介如何通过与人共生的方式影响并形塑当代主体的生存形态。3. 批判性反思数字化生存所导致的意义危机,使人们对数字媒介效能逻辑的消极影响有所警醒,避免走向虚无主义。要言之,技术元叙事呼应当代技术哲学对于数字主体的关怀,力图为数字媒介时代的主体生存提供一种结构化经验范式。

一、技术史视域下数字媒介的演进历程

从技术视角考察数字媒介时代人的生存情态,需首先梳理数字媒介演进的技术史脉络。尽管“数字媒介”已成为学界指代各类数字化信息生产与传播载体的通用术语,但其技术物谱系因数字媒介自身存在一定的时间与技术跨度而不甚明晰。唯有厘清从数字技术到数字媒介的演进历程,明确数字媒介所涵盖的技术物范畴,才能严谨总结数字媒介时代的生存论内涵。此外,作为数字媒介“器官”的技术元素,承载着其功能实现。技术元素随着数字媒介的演进而不断迭代与扩容,并且在与人的使用交互过程中,将其影响力渗透至人的生存维度。如果说“技术元素的图式”([2], p.51)表征着数字媒介的技术特征,那么对数字媒介演进过程的检视,则能进一步揭示数字媒介在当下如何深度影响并形塑人的生存形态。根据特定历史分期内作为主导力量而现身的媒介的不同,媒介技术史可分为官能性信号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和数字媒介四个独立的技术模式阶段,分别对应着四种技术文明及其所形塑的生存形态,旨在获得最大化效率的效能逻辑,能够描述媒介技术史的内在规律,表明不同技术模式之间的演进并非断裂式的而是过渡式的。相邻两种技术模式存在时间和技术维度上的重叠期,而过渡性媒介则在此期间发挥着承前启后的效用,其一方面保留前一技术模式的某些特征,另一方面在效能逻辑的驱动下,

开启后一技术模式的发展方向。

在数字媒介与印刷媒介之间,电子媒介是关键过渡性媒介。在技术物层面,电子媒介尽管保留着印刷媒介的某些特征,实质上已是电气化装置。电的应用之于媒介生产,不仅提升了机械化生产效率,而且催生出标准化、体制化的行业规划,开启“技术与利润的‘有机’结合先于技术与科学的结合”^[3]的生产导向。从传播效应来看,作为电子媒介的技术雏形,19世纪上半叶诞生的电报机利用无线电将传播转化为编码、发送再到解码的过程,随后摄影术则“规避了早期记录媒介的心理抽象问题”。([4], p.94)二者在即时性与原样性的意义上,促成媒介传播的革命性飞跃:一是传播摆脱了时空限制,照片的崭新贡献是准确、完美的跨时间延伸。二是传播方式的多元性。电子媒介不仅实现了动态传播,而且广播、有声电影和电视等媒介恢复了上古时期的声音传播,与视觉传播一道构建起更加立体的传播空间。三是传播内容的现实性。无论是照片、录像还是磁带,都不再如文字和绘画那样是对现实世界的抽象化表达,而是直接取自现实世界并加以保存和传播,因而它们“不是用于表现世界的作品,而是世界本身的片段,它们是现实的缩影”。^[5]如是三个优势同时表明在效能逻辑的驱动下,电子媒介的生产形态与内容开始以传播效率为首要考量,即“目标不是信息本身,而是必须产生效能影响的信息”,^[6]由此加速媒介场域的开放,以及技术、科学与资本的联合。

与传播效应的提升相辅相成的是,电子媒介的计算力亦获得长足发展,在信息的处理、存储和检索方面不断涌现技术潜力。在20世纪40年代,以“ENIAC”为代表的数字计算机的发明作为一项质变意义的技术事件,标志着依托电子媒介的技术积累,数字媒介以独立技术模式的形态诞生。在技术物层面,数字媒介相比以往媒介最为鲜明的差别在于,其自身是硬件系统与软件系统的结合。人们使用数字媒介,指向于软件系统的功能实现,这需要一定的技术元素作为中介。软件系统的内嵌及其与硬件系统的独立运行,促使数字媒介展现出前所未

有的效能优势,实现对电子媒介的代差式超越。此外,基于数字媒介与电子媒介的技术共性,在计算机工业的助力下,数字媒介亦可成为电子媒介的“补救性媒介”(remedial medium)。^[7]从传播效应来看,数字媒介的数字传输相比于电子媒介的模拟传输,不仅更加可靠,而且在传播的质和量上均有质的突破。以此为基础,数字媒介演进历程中的两个重要节点,促成了“21世纪新文化范式”^[8]的数字文明的确立,人类也随之开启了数字化生存进程。

一是互联网的成熟和普及。互联网之于媒介技术史具有划界意义,它不仅是一个数据空间,更是全球性的文化社区,也是在社交规则、角色定位等各方面与现实无异的交往场域,这意味着互联网传播既是内容的扩散,又是传递某种价值观乃至意识形态的过程,从而数字媒介既是技术装置又可视为文化转换器,“使知识的产生、获取、传递、理解、支配等文化的构成因素发生转变”,^[9]深刻影响人们的认知与行动理念。Web 2.0时期以来,互联网逐渐确立“大集市传播”^[10]模式,推动数字媒介超越单向传播的电子媒介,成为去中介的互动性“现场媒体”。大众不再仅仅是接受者,也是互联网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媒介场域的运行机制自此被深刻变革。

二是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设备走向大众化。互联网通过家用电脑只能占据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特定时刻。真正促成互联网渗入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则是移动终端设备的普及,特别是智能手机,其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内便从作为通讯工具的移动电话演进为“决定了生命存在之一的人的特征并构成人类进化的现实”^[11]的“代具”(prothèse),期间智能手机的有用性与互联网的发展保持着同向互促关系。诚如韩炳哲所言,智能手机首先“极大地影响了人们与世界的关系”,进而推动“世界显现在完全可控的数字化表象之中”。^[12]

综上所述,数字媒介既包括经由电子媒介的数字化升级,兼具两种技术模式的跨代媒介,也包括完全数字化架构的媒介,突出的传播效能优势使数字媒介再现了“前技术世界的通信

是完全灵活自由”([4], p.139) 的图景。其中,数字媒介作为互联网的终端,通过数据与算法实现现实的虚拟化,而人们通过屏幕等中介进入数字媒介空间,则是虚拟的现实化过程。在此意义上,所谓数字媒介“再现”世界,实是数字媒介空间具有超实在的现实性特质。芬伯格以技术编码为例,指出在技术运用的背后,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结合。^[13]同理,数字媒介的效能逻辑亦与其价值导向相辅相成。梳理数字媒介的演进历程虽能揭示其效能逻辑与技术特征,但价值导向的明晰,还需进一步考察数字媒介对于当代主体生存的影响方可实现。

二、与媒介共生： 数字媒介时代人的生存论内涵

数字媒介的演进历程不仅表征着其技术模式的迭代进化,而且揭示出一种深刻的存在论转向。以媒介交互为中介,数字媒介在感知、文化、价值观等层面逐渐改变人的媒介使用习性,以此参与建构人的日常生活序列,“人们客观地看到技术关系的首要条件,是将对技术现实的认识及其隐含的价值整合到文化里面”。([2], p.131) 在此意义上,数字媒介不再仅是人们展开认知与表达行为的技术载体,其更是与人们确立了“背景关系”(background relations),即数字媒介是“当下技术的部分或整体的场域……处在背景的位置上……通常不在焦点位置,但是却调节着居民的生活情境”。^[14]于此而言,数字媒介“开启”了数字媒介时代,人类步入以数字技术为背景、数据算法为核心、界面交互为依托的数字化生存,日常生活基于人与数字媒介的共生关联,发展出三重鲜明的特质:

一是数字媒介的连接特质所实现的“身体的数字化延展”。技术影响乃至形塑人的生存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其对于身体的改造而实现的,“技术态身体……意味着生产技术与知识都在向内部移动,侵入、重构并愈益支配着身体的内容”。^[15]随着数字媒介深度参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身体不再只是自然化的知觉

与行为的起点,而是成为技术延展的媒介化接口,数字界面、可穿戴设备等代具成为新的“身体组织”。由此,人们仅通过屏幕便可精准把握自身的生理状态,不再需要借助于种种模糊的自我检测方式,由身体的量化所带来的日常生活的非物化成为数字化生存的常态,“我们不再迷恋物,而是迷恋信息和数据。与物相比,我们在此生产和消费了更多信息”。([12],p.5)在此过程中,身体的感知边界被数字媒介进一步地放大。在数字媒介时代之前,媒介作为孤立的技术单元使得身体的具身性感知始终是有限的,而借助于数字媒介的连接性,人们在数字媒介空间中创造出了虚体化的,“构成了人的影子或影像”的“宁芙”,^[16]其摆脱了时空对于肉身的限制,能够从数据和算法堆叠而成的非物中不断攫取。人们不再需要身体去感知世界,以及抵达世界中的现实场所。通过卸去身体行动的负担,人们获得更为轻盈的生存体验,“宁芙”亦成为数字化生存中的身体隐喻。

二是数字媒介的补偿功能所确立的“主体的算法共构”。主体在现代性语境下被视为无所不知与无所不能的世界创造者,([17],p.153)但此种构想与现实中的有限性个体之间存在明显落差。而在数字媒介时代,借助算法加持下的数字媒介作为代具式弥补,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主体性的重塑。其中,算法之于人们而言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更是参与人们经验范式的建构,即人的认知与行动模式逐渐向算法逻辑趋近,促使人与算法呈现“共构”关系。

一方面,算法使数字媒介空间中每一内容背后,都潜藏着庞大的关联信息场域,不同内容场域在算法调度下形成复杂的关联网络,使“通过数据学得过去的、现在的以及未来的所有知识”^[18]成为现实。当人们从中无所限制地获取意义时,由“信息的狂热”(Infomanie)所带来的快感,表明“我完全掌控着世界。世界是以我为尺度而建立起来的”。([12],p.33)此种掌控感的实质,正是人们的选择偏好成为算法训练的素材,而算法助力下的内容推动则反过来强化了人们的选择偏好,此种内容呈现

特性显然是以往的所有媒介其线性的“输入-反馈”机制所不具备的。另一方面,数字媒介促成每一个体都能成为媒介生产者,人们通过诸多低门槛的方式进行日常生活的媒介表达,推动“全民创作”这一媒介景观的形成。但与以往的自律性创作不同的是,此种创作是以算法可见性为前提,内容是否被平台推荐进而产生良好的传播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算法对互动频率、停留时长等变量的计算。人们意欲使其表达获得更大的反响,就必须迎合算法逻辑,意味着作为“自我的显性产物”^[19]的表达,实已成为人与算法共同生成的结果。

三是数字媒介的技术元素特性所促成的“时间性的生成循环”。哈拉维(Donna Jeanne Haraway)对数字媒介时代“人无可逃避地生存于技术的架构之中,他的生活世界为技术所宰制,他的身体是一个可能的和现实的技术筹划和干预的领域”([20],p.95)的论点,揭示数字媒介对于人的强控制力,突出表现为人的自然时间向技术时间的嬗变。数字媒介通过持续更新与即时反馈的内容生产,“‘使钟表停止’,使时间失真”,^[21]将人的经验获得收缩为无休止的“现在”时刻,与以往媒介在线性时间序列上的内容呈现有别,数字媒介的每一次刷新即是一个当下时刻的涌现,以致出现意义生成的循环性结构。此种情形之所以出现,归因于以下几个方面:

在技术物层面,数字媒介愈发契合人的生理感官特性,并与时尚趣味亦步亦趋。此外,循环性的根源则指向于算法机制。由此,人们的注意力高度聚焦于当下更新的意义流,在被“理解”与被“满足”的状态中,人们的时间感知被削弱,不再面向未来或追溯过去,而在不断刷新的意义流中沉溺于即时可得的满足感,致使其对数字媒介产生极大惯性依赖,陷溺于“任意流动、超速运行的控制形式”,^[22]从而在看似自由选择的媒介使用中,人们的时间经验以“现在”被同质化。犹有进者,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进一步加速了媒介生产与反馈的节奏,人们在算法的驱使下进行投喂以参与到“生成着的现在”中,即一切媒介生产

的意义均指向于此时此刻，并不存在持久有效的媒介经验。由此，传统时间观中作为间歇的“留白”时刻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无缝衔接的即时感知与反馈，导致人们在获得畅快且麻木的媒介体验同时，出现意义感知的当下循环。

综上所述，在数字媒介时代人不仅是使用数字媒介，更是被数字媒介生成与定义，即“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23]数字媒介的效能逻辑一方面推动其技术演进，另一方面也影响乃至形塑了数字主体的生存形态。由此，人们由于自身有限性而被限定的生存边界在很大程度上被突破，因而完成数字主体的身份转换而与数字媒介共生，成为主体自我解放的一种途径。但此种人机共生结构并非始终是平衡的，效能逻辑的激进化将导致共生失衡，从而使人由于数字媒介其座架之力的规训走向异化，引发在世生存的意义危机。

三、共生失衡： 数字媒介时代人的意义危机

数字媒介的迭代发展，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更加丰富与便捷的生存体验，而且助力于人的自我增强，使人逐渐走向赛博格化的主体。但数字媒介的效能逻辑并非始终契合人的合规律良性发展理念，其在资本驱动下一旦偏离人本基点走向激进化，则无疑将导致人们在数字化生存中，与数字媒介的共生出现失衡症候，“‘巨机器’无限制地追逐于权力和金钱，却疏远了人格、生命和生活”。^[24]由此，数字媒介的价值导向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人们展开生存的前视域，人们行动指向的是数字媒介化的意义，意义的反馈亦由于数字媒介的滤镜式处理，行动与意义不再具有源初统一性，致使人们丧失了价值判断与价值抉择的能力，在日常生活中面临坠入虚无主义的风险。对此，可从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是感知过载所导致的意义均质化。数字化延展表征着媒介经验从深层意义建构到表层感官满足的转向，人们在数字媒介空间中自由地攫取，以期获得更多的意义充实。同时，数

字媒介突破了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关于媒介的发展就是某一感官的分割和延伸的观点，^[25]因而此种意义充实在形式上更为丰富。然而，多感官的激活并未带来具有深度的意义内容，而是导致身体时刻处于过载状态。例如，无限滚动、即时推送与算法推荐共同塑造出一种被动的注意机制，人们的每一次滑动都被记录与计算，以使其下一次滑动能够带来精准匹配的刺激。其中算法根据特定内容偏好，将人们充溢着可能性的感知收缩为可预测的反馈模式。在算法的驱使下，数字媒介的个性化定制极大窄化了人们的经验视野，在形式多样的媒介内容背后，是单一的价值意蕴，因而种种媒介内容之于人们无异于信息“噪音”，“世界不仅被排泄物和垃圾污染，也被交流和信息的垃圾污染……一切事物都聒噪地冲向注意力”。（[12]，p.132）

尤有甚者，平台方还会以插入广告等方式进一步降低用户对于意义性的敏感度，使其时刻处于被消解独立思考能力的促逼当中。此外，身体在匆忙与沉迷状态中逐渐钝化，亦会加剧此种症候。例如，数字媒介频繁的刺激如屏幕亮光、提示音等对于身体而言鲜有积极的感知与行动指导意义，反而使身体逐步形成了高度自动化的反应机制，身体的感知阈值不断升高，直至对现实的变化失去敏感。如是两个方面不仅使人在使用数字媒介中不再主动生成意义，而只是被动地感知世界，而且表明算法等种种数字化技术制造差异性表象的背后，实则推动意义的深度同质化。有别于此，传统的书籍阅读则能够允许人们自行选择意义获取方式，“先于个体存在的书籍就是这样的图像、环境和媒介，在阅读中个体自我创造，也自我认知”，^[26]其尽管不具备专属定制的能力，亦不会给予人们以形式多样的刺激，却能够在主体的挑选和阅读中敞开完整的意义叙事，构成多元的意义整体。

二是数据代劳所导致的意义浅表化。物的意义深度开启于主体与之打交道的过程中，而开启本身则指向于物的意义空间。数字媒介空间由海量数据堆叠而成，本质上是一种“无世

界”(weltlos)的存在。人们在数字化生存中通过媒介交互对数据进行摆置,意在拓展意义认知边界,抑或借此取代在现实中的身体力行。但数字媒介空间并不具备意义深度,所有数据的意义来自其通过算法为人们所用的过程中。借助算法进行检索固然使人们无需由深度思考而自行选择,但这意味着媒介内容呈现的主导权让渡于算法。所谓的算法最优结果,实则是建立在统计基础上的平均结果,这一机制无疑导致了意义的浅表化输出。

此外,数据与算法深度参与日常生活亦会导致生存的浅表化。从智能驾舱到各种日常规划类软件,无不致力于感知人的生存体验并将之数据化、模型化,世界的偶然性意蕴由此被消解,“根本的存在论的偶然性或世界本身的偶然性就是那种一劳永逸地奠基了我们真理观念的东西”。^[27]由此看出,数字媒介的有用性虽能满足人们的即时需求,却导致意义的获得流于实用层面,既失去了向更丰富精神维度延伸的可能,也无法在意义建构中形成连贯且深刻的价值关联,使人无法领会意义背后与生存本质相关的深层内涵。有别于此,人们能够在自然化的场所中领会丰富的场所精神,“人类聚落的场所精神事实上代表一个小宇宙……所有的城市都必须拥有这些使城市住所以存在的意义范畴”。^[28]现实场所的意义空间所绽出的不仅是数据空间那种纯然的有用性,而且更有场所本身聚合的与种种生存情态交织的世界图景,正如海德格尔以“一个钟声穿过年轻的心,梦想,祈祷和游戏”^[29]描述其在一座钟楼前之所见,此种饱含人性、鲜活生动的意义空间显然是通过数据和算法的堆叠所无法构建的。

三是数字化生存中的时间经验异化。“时间性的生成循环”表明人们在数字化生存中尤为注重“现在”时刻。此种时间意识的背后,正是人们意欲跟进数字媒介空间中每一个涌现于当下的内容更新,正如尤西林指出,在高度技术化的现代性时间中,“现在”的意义即是未来。^[30]然而,追求被技术逻辑不断锁定的“现在”,却导致人们困于这一媒介沉浸化的当下时刻。其中,时间不再是从过去到未来的线性

流动,而是被压缩为永不停止的即时再现。每一次信息的生成、推送与反馈,都是一个自足的“现在”,既无法通联过去,亦封闭了未来。人们置身于此种循环结构中所体验到的时间,只有永恒的当下,而无延展的未来,并且由于自身始终处于频繁震颤的被动响应状态,致使其时间经验丧失了方向性。

此外,时间经验异化的另一表征是记忆保存去主体化。在互联网特别是云端存储功能的加持下,数字媒介的存储力和表现力有了质的提升,越来越成为人们意义记忆的重要途径,“新媒介档案既是个体化的,又具有高度协作性,它们成为了新的大众记忆形式出现的场所”。^[31]意义记忆的去主体化,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的记忆负担,使其在意义爆炸性增长的当代拥有更为轻盈的生存,但首先造成了意识能力由于数字媒介的代劳而钝化,例如提笔忘字几乎成为当下每个人都经历过的窘境。其次,以数据而非人脑记忆意义,意味着记忆不再是回溯过去,而是当下使用检索框进行搜索、拼贴行为,致使意义构造不再基于经验事实而是数字逻辑,从而导致机械性异化,譬如各种意义之间由于取消了价值等级差异而呈现出的非线性跳跃关系。同时,异于主体的意义记忆必然存在着不确定性风险,“它是一种从数字化存储的有限信息中,重构出的人造过去,一种缺乏时间线索、完全扭曲的拼图,而且可能会同时被它所包含和不包含的东西所篡改”,^[32]导致主体意义构造的停滞,而意义扭曲如谣言的出现也会影响主体的决断。有别于此,人脑所记忆的或许只是简单的生存片段,但对于生存的重要性要甚于通过数据而构造的完整却鲜有生命力的意义。

如是意义的均质化、浅表化,以及时间经验的异化,最终导致人的超越性意义追求的意志被消解,人与数字媒介由共生关系失衡异化为数字媒介对人的单向反身关系(reflexivity)。^[33]人们寄希望于在数字媒介空间中获得更多的意义作为生存的指引和依靠,期间虽卸去了生存的重担,但实质是滑向“本质性窘迫之缺席”([34], pp.242-244)的情态。获取意义的欲

望遮蔽了对意义其意义性的反思。例如，人们在休闲时更愿意通过消极地“刷”手机打发时间，而不愿在现实中以行动的方式积极地自我充实。长此以往，随着意义危机的愈演愈烈，人的在世生存将陷入到无根性的困境当中，只有借助数字媒介才能获得短暂且内涵空洞的自我充实与慰藉。但数字媒介空间终究无法安顿人的生存，过度的媒介依赖实则表明人因其拒绝向世界开放自我而遭遇遗弃，即“我们发现我们自身——作为此在——完全被置之不顾，不仅无法沉沦于这个或那个存在者中，此在也无法持存于它自身的这个或那个方面，作为一个整体被遗弃”，（[34]，pp.139-140）由此深陷数字媒介时代的虚无主义泥淖。

结 语

数字媒介时代的技术元叙事其相对历史分期内的合法性，意在修正现代性元叙事，而通过效能逻辑，在对历史性与普遍性阐明的基础上，力求对当下的技术情形予以合理定位，则是对后现代解构性语言游戏的诊断及统合。于此而言，技术元叙事亦是技术生态，此间超克种种对立，促成技术图景的显现作为以技术为原点的多因素互促共生的结果。对于人们而言，技术元叙事一方面在意义流，即“在渐次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起点中，各个意义作为统一而被构造出来——这些意义将这些渐次出现的起点彼此连接在一起”^[35]的意义上，揭示其数字化生存形态，另一方面其聚焦当下的生活世界，通过考察数字化生存的积极与消极之维，启发人们如何实现本真性生存，从而在数字媒介时代能够泰然处之。利奥塔“大多数人已经失去了对失去的叙事的怀念本身”^[36]的喟叹，道出了居于技术迭代不断提速的当下，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一种结构化经验范式去展开其认知与行动，而数字媒介时代的技术元叙事不失为一种可资借鉴的建构方案。

〔参考文献〕

[1] 余明锋. 技术时代的元叙事——重读《后现代状态》[J].

书城, 2021, (6): 72-80.

[2] 西蒙东. 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M]. 许煜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4.

[3]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后现代状态: 关于知识的报告[M]. 车槿山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56.

[4] 保罗·莱文森. 人类历程回放: 媒介进化论[M]. 郭建中译,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5] 苏珊·桑塔格. 论摄影[M]. 黄灿然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 10.

[6] 西蒙斯、刘丽苹、铁省林. 利奥塔与后现代技术科学[J]. 世界哲学, 2023, (1): 134-149.

[7] 保罗·莱文森. 软利器: 信息革命的自然历史与未来[M]. 何道宽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90-98.

[8] 阿兰·科比. 数字现代主义导论[A], 陈后亮译, 苑洁: 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理论与媒介传播[C],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546.

[9] 吴致远. 技术与后现代语用学——利奥塔技术思想述评[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8, 24(6): 43-48.

[10] 方兴东、严峰、钟祥铭. 大众传播的终结与数字传播的崛起——从大教堂到大集市的传播范式转变历程考察[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0, 42(7): 132-146.

[11] 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 爱比米修斯的过失[M]. 裴程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56-57.

[12] 韩炳哲. 非物: 生活世界的变革[M]. 谢晓川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23.

[13] Feenberg, A. *Transforming Technology: A Critical Theory Revisited*[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4.

[14] 唐·伊德. 技术与生活世界: 从伊甸园到尘世[M]. 韩连庆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116.

[15] 克里斯·希林. 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M]. 李康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88.

[16] 吉奥乔·阿甘本. 宁芙[M]. 蓝江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6, 64.

[17] 维尔纳·科尔施密特. 浪漫派之虚无主义[A], 刘森林、邓先珍: 虚无主义: 本质与发生[C], 邓先珍、高海青、徐瑜霞等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153.

[18] 佩德罗·多明戈斯. 终极算法: 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如何重塑世界[M]. 曹芳萍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7, XXI.

[19] 恩斯特·贝勒尔. 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理论[M]. 李棠佳、穆雷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184.

[20] Munnik, R. 'Donna Haraway: Cyborgs for Earthly

- Survival?'[A], Achterhuis, H. (Ed.) *American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The Empirical Turn*[C], Crease, R. P. (Tran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 95.
- [21] 洛伦佐·查尔斯·辛普森. 技术、时间与现代性的会谈[M]. 张成岗、高岸起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25.
- [22] 约翰·阿米蒂奇. 维利里奥论媒介[M]. 刘子旭译,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19, 81.
- [23] 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M]. 胡泳、范海燕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7, 15.
- [24] 赵俊海、刘永谋. “巨机器”时代人的异化及其救赎——简论刘易斯·芒福德人文主义机器哲学思想[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5, 31(11): 104-109.
- [25]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 留声机 电影 打字机[M]. 邢春丽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15-17.
- [26] 玛丽埃尔·马瑟. 阅读: 存在的风格[M]. 张琰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17.
- [27] 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M]. 杨大春、张尧均、关群德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545.
- [28] 诺伯舒兹. 场所精神: 迈向建筑现象学[M]. 施植明译,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0, 75.
- [29] 海德格尔. 从思想的经验而来[M]. 孙周兴、杨光、余明锋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125.
- [30] 尤西林. 现代性与时间[J]. 学术月刊, 2003, (8): 20-33.
- [31] 尼古拉斯·盖恩、戴维·比尔. 新媒介: 关键概念[M]. 刘君、周竞男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81.
- [32]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删除: 大数据取舍之道[M]. 袁杰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154.
- [33] 赵汀阳. 假如元宇宙成为一个存在论事件[J]. 江海学刊, 2022, (1): 27-37.
- [34] 海德格尔. 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M]. 赵卫国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 [35] 利科. 胡塞尔与历史的意义[A], 倪梁康: 面向实事本身——现象学经典文选[C],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0, 806.
- [36]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M]. 谈瀛洲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143.

[责任编辑 王巍 谭笑]